

王守雪 著

人心與文學

清園



徐復觀文學思想研究

鄭州大學出版社

王守雪 著

徐復觀文學思想研究

人心與文學

清園



鄭州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心与文学:徐复观文学思想研究/王守雪著. — 郑州:
郑州大学出版社, 2005. 9

ISBN 7 - 81106 - 209 - 7

I. 人… II. 王… III. 徐复观(1903 ~ 1982) -
文学理论 - 研究 IV.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99825 号

郑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市大学路 40 号

出版人: 邓世平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制

开本: 710 mm × 1 010 mm

印张: 16.5

字数: 341 千字

版次: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邮政编码: 450052

发行部电话: 0371 - 66966070

1/16

印数: 1 ~ 2 100

印次: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 - 81106 - 209 - 7/I · 9

定价: 3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社调换

从柏林寺到丽娃河(代序)

胡晓明

王守雪博士的《人心与文学——徐复观文学思想研究》就要出版了,灯下翻书,想起我与新儒家学术的一些个人因缘。有些事情,可以借此略略一说。

二十二年前(1983年),我千里负笈,来到长江边上的一个江南小城读书。当时,那还是一个比较安静、颇富于过日子意味的小城市。学校在城里的湖边。读写之余,我沿湖而行,穿行于城市的街巷人群之中,常会有异乡人的感觉。而且,偌大一个城市,似乎只有我一个异乡人,操着与大家不一样的语言,抱着与大家不一样的思想。傍晚时分,有时去江边漫步,望着茫茫的江水,想一个问题:我从哪里来?我来要什么?我那时刚刚经历了四年的本科学习,那是极为充实而富于思想激荡的岁月。我现在自愿离开了一切喧闹,然而生命忽然变得空无着落,狂奔之后的失却方向,而面前的江水似示我以宇宙人生的苍茫无边。……快到放假时,江边一声声汽笛,又教我魂飞梦萦于家乡、亲人。总之,我的生活世界似乎正弥漫着一种感伤、怅惘、自我放任,以及虚无主义。我似乎变得很“小布尔乔亚”(今天的说法是“小资”)。正是在这个时候,我遭遇了熊十力。一开始是《新唯识论》,然后是《十力语要》。——这个顺序很重要。《新论》的语言太好了,刚健、清新、有力量,也有嚼头,一扫洋八股味儿。而且,《新论》

的系统很舒服,很适合于我们那总是不满、总想颠覆点什么(八十年代人的通性)的狂想。《新论》还有些传奇,如熊与欧阳竟无的故事、与王恩洋的故事,以及周恩来下令只印了五十部以赠友邦,再加上我个人的师友因缘与这部书的联系等等。那时,书的“在世”意味,总是比现在要本真得多。接下来的《十力语要》也很重要,又纯正、又随意、又直指人心。总之,将我从“小布”里拔出来,开始企慕着“大人之学”。接下来那几年我常常来往于长江上,看鸥起鸥落、日出日没,“哀吾生之须臾……托遗响于悲风”的情绪,不是没有了,而是,我将它作了一个底子,翻上来,正是透破那“物与我皆无尽”的天机。从此浩浩长江、一天星月,皆成此妙谛法身。我于是懂得那古时的文学不止是美文,这是通过熊才有的欣喜。熊成了我通往中国文化幽深处、佳胜处的一个桥梁。后来,熊先生也成全了我和导师王元化教授的一段因缘。记得那年和先生在复兴路上散步,车水马龙、灯影婆娑,先生一路说熊,从性情到学问,索性又带我去看淮海路熊先生的故居,我们踩着吱吱作响的楼梯拾级而上,敲开那久已换了主人的房门……这都是后话了。

熊十力先生,那是我生命中一段风力,借得这风力,便通得过人生的关口。海德格尔曾说:“没有无的原始启示,就没有我性和自由。”然海氏说也不周,只是光秃秃的无,哪里够。我先是放下一切,体认原始的无,然后由此翻上来,转成我性,开启自由。我生命中有此一转,前面便觉风光精彩,从此便是不厌不倦。熊说来便是如此简单的好。

还要提到的是,接下来的第二年冬天(1984年),我只身往北京访学。北图的管理员告诉我,我所需要看的那些书,包括钱穆、牟宗三、唐君毅、方东美、徐复观等的书,以及《学原》、《鹅湖》等杂志,现已迁到一个叫柏林寺的地方。我好不容易找到了坐落于雍和宫东侧的柏林寺。至今已不甚记得,这是清代哪一个皇帝修过的古寺,当时感觉阅读的环境极佳。一间长长的厢房中,两面都是开敞明亮的玻璃窗。

气氛出奇的安详、踏实而宁静。外面是刺骨的寒风,里头温暖如春。火炉上一只大铁壶总是“滋滋”地冒着热气。开水是免费供应的,中午,我常常就着火炉烤馒头吃,然后直到关门才离去。我惊异地发现,那里的书已经等我很久。如果说,我今天已了解,讲中国的历史与文学,除了讲辞章之学,考据之学外,仍须讲文学大义,那么,这一新的天地,正是柏林寺为我打开的。柏林寺不啻为我的学问生命的一种特殊地缘。这些年,我时时在想,冬天里的柏林寺,几扇疏疏地洒入阳光的窗棂,异样隔绝而充实的读书气息,以及那个“滋滋”冒着水气的大铁壶……还有么?

当然,我还没有提到我的祖父易建文以及他的同事、我的古典文学启蒙老师赖高翔先生(唐君毅先生曾赞他为“足下之心性行为,可为中国文化之代表”,见《唐君毅全集》30卷120页),我的祖母,也是我的《论语》启蒙老师胡佩玖先生,以及引我读熊著的挚友邓小军教授。长时间来我一直对所身受的学术文化机缘,怀着深深的幸福感,道出其中的好处,这需要另外的篇幅了。

于是,大约从九十年代中期,有关熊十力、牟宗三等人原典的硕士生课程,以及有关徐复观的博士生专业课程,就在丽娃河畔,一年年开讲了。当然,这不仅在上海一地,是特出的,在大陆的中文系里,也是特出的。硕士生的课程即《国学概要》,由我与系里的其他老师合讲,分义理、考据、辞章,我负责义理部分。选《论》、《孟》原典和现代新儒家原典,如《十力语要》和《生命的学问》、《五十自述》等讲读。博士生课程即《现代中国学术原典》,试图透过徐复观、钱穆、钱锺书、陈寅恪等近现代文史大家的作品,研读之讨论之,由此进入中国文化思想的幽深处。高翔师曾说:近人著作不可不读。今人去古已远,近人恰如座座桥梁,可以因其接引而进入古代。这正是我的宗旨。

教学相长,我也发表了系列论文,其中重要的如《中国千年文学的守灵人》、《重建中国文学的思想世界如何可能》、《二十世纪中国诗

学史小言》、《中国文论的正名：近年来中国文论研究的“去西方中心主义”》，以及陈寅恪诗学的一系列论文，旨在表明西方诗学与现代诗学之外，有另外一支系统存在。其特点，既有中国文化的学养，又有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和文化心灵。至今，这一项工作仍在继续中。

三年下来，弟子们深受此一学术传统的吸引，纷纷以诗学为范围，以沈曾植、陈衍、陈三立、钱穆、徐复观、陈寅恪、马一浮等为个案研究来选题，其中有的已经毕业，论文答辩均广受好评。此一“近现代学人与诗学博士论文系列”，答辩委员也鼓励有加。

守雪博士早在1996年即以“曾国藩的人格与学问”为题完成硕士论文，对于近现代学人与文学思想一脉，投入极大关注。进入《现代中国学术原典》的课程，自然与徐复观一拍即合。我们往复讨论，守雪思想活跃，有探索热情，对材料也非常用心地搜集。课里课外，有关理性与生命，理性在当代的有限与使命，有关士人的文学传统，以及关于《文心雕龙》，关于庄子艺术精神，关于读中国文学的方法等问题上，他都沿着徐复观的路子，往复于文学与思想，诗与政治文化之间，有深入的思考。作为第一本讨论新儒家诗学个案的博士论文，比起那些走马观花或追赶时尚的，要真诚得多，学理充实得多。对于徐复观深阔大美的文学思想世界，发明不少，所论每有启人深省之处。他的不足之处也是存在的，这有待于有心的读者以更多的真诚态度，更丰富的学理，进行更深入的讨论。

关于徐复观文学思想的得失，我已经在其他文章里写了，这里不再赘言。我有三点感想，也想借此机会简要表述，以结束此篇序言。

一，十年前，我在一本书的小引里写道：“我总固执地相信，研究中国文学的大路，重要的是由中国哲学与历史文化思想的中心，一层一层地透出去，而不应只是从分散的文体、语言、风格、作家的研究，再慢慢地综合起来。没有思想的文学，只是僵死的文学、幽暗的文学，文学史的研究者的心灵不应只是在一棵大树的叶面上盘桓，而更应深入其树汁流淌的根干，体会那些枝叶与枝叶如何交会于中心的

根干的。以中国文化思想为主位的研究心态,即不止是凭吊古迹,不只是参观博物馆,不止是分析古代的化石,而应是视我们的研究对象为一整幅活的生命,活的生命灵根,活的生命的情种。”现在看来,虽然将本末对立起来的看法是有些简单化,然而我着眼于文化意涵的大判断仍基本不变。最近也曾撰文提倡文学研究中多一点文化心灵的关注。在我看来,尽管十年来中国文学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度,但是文化心灵的同情体认、深入了解,仍然是不够的。再具体而言,像徐复观这样的观照于文学与思想之间,一方面提炼出儒道释思想与文学相互交涉而产生的结晶,另一方面深入理解与抉发文学背后的历代士人真生命真性情的活跃与沉潜、悲喜与高致、病痛与境界,这完全可以成为文学研究的一个学派,可惜至今仍然不成气候。

二,以我对二十世纪中国诗学学术传统的观察来看,不管他们有多少不够精密之处,甚至不管他们有多少摆脱不了的时代有限性,但是在今天看来有一点仍是不可及的,那就是真切的人间情怀,遂使此种研究本身,成为一种有性情有思想的诗学。环视今天的学坛,回顾我自己所参与的各种学术会议,所听所想所感所见,则无论是鲁迅的传统还是徐复观的传统,各自都是寂寞。庄生所论:不闻越之流人乎?去故国数日,见其所认识者而喜;去故国数月,见其所见者而喜;去故国数年,则见其似人者而喜。这才是令我辈思之再三而不能不心惊之事。

三,当下,中国文化的复兴成为时代精神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不能不看到,这既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也是遭遇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危机不仅来自全球化与科技至上、功利主义及工具主义的空前强劲势力,而且也来自西方文化内部自身的空前危机,即所谓“排他性物质主义的宗教”(史华慈语);不仅有中国社会自身巨大转型的迫切问题,而且又有由于上述全球化而来的多重困境,以及新老意义迷失和由此而来的认同与选择问题。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中国文化经徐复观先生等人的惨淡经营,已经从一个“已陈之刍狗”

(陈寅恪语),变成了文化思想建设的“资源”。那么,我们在读徐复观有关中国文化的那些文字时,倘不仅仅以专家之学视之,而能从更大的文化精神层面着眼,或将有更多的启示乎?

2005 年 7 月 21 日

导 言

徐复观,原名秉常,字佛观,业师熊十力为他易名为“复观”。湖北省浠水县人。生于1903年1月31日(农历正月初三),家世清贫,父祖辈且耕且读。8岁发蒙读书,12岁考入浠水县高等小学,三年后毕业考入湖北省第一师范学校,五年后毕业,曾短时间担任过小学教师,1923年,考入湖北武昌国学馆,从王季芎(葆心)、黄侃(季刚)等大师攻国学,1926年毕业。随后结识同乡陶钧(子钦),并受之援引投入现实政治军事生活之中,初任营部中尉书记。1928年初,赴日本留学。先入明治大学攻读经济学,后于1930年正式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九一八”事变起,徐复观在日本因反抗而入狱,后退学返国。1932年起在广西军中任职。1935年任浙江省政府上校参谋,同年与王世高结婚。抗日战争爆发后,参与娘子关战役、武汉保卫战,任荆宜师管区司令、中央训练团少将教官。1943年,以军令部联络参谋名义,派驻延安,结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高层领导人。回渝述职,得到蒋介石赏识,以军委高参名义,调至参谋总长办公室,任联合秘书处秘书长随从秘书、侍从室第六组副组长、党政军联席会报秘书处副秘书长。同年始问学于熊十力。1946年以陆军少将退役,后与上海商务印书馆合办《学原》月刊。1949年迁居台中,另在香港创办《民主评论》半月刊。1952年受聘为台中省立农学院兼职教授,三年后,东海大学成立,受聘为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1958年,与牟宗三、唐君毅、张君勱联名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

1969年,因与梁容若之争,被东海大学校方强迫退休。旋即移居香港,任新亚书院、新亚研究所教授。另外特任《华侨日报》主笔。1982年4月1日病逝于台北。

中国文学,是中国固有的文学,也应该是中国当下的文学。然而有一种现象,在古今新旧的名目之下,判然分立若异质之物,则中国固有文学精神的芜塞、经脉的郁滞,也可以大略得见。这并不排除在长期的历史中,在专制制度下,中国文学思想的一些脉络,如生命精神、理性精神、民间意识等,已经被扭曲变形;更重要的是,自晚清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动,中国文化遭遇主流强势文化的冲击,受到多重破坏,中国文学中“人学”的传统基本中断。徐复观作为现代新儒家宗师之一、著名思想史家,对中国文学一些关键性的问题,提出来加以疏解,具有重振中国文学纲维的意义。在这里,再一次打开徐氏的论域,则不仅展示他在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中的贡献,也想以一种特有的视角,来发现中国文学演进中的问题,找回中国文学的中国性,探索中国文学的出路。

《礼记·经解》云,“疏通知远,《书》教也”;又云,“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孔颖达《正义》曰:“《书》录帝王言诰,举其大纲,事非繁密,是疏通;上知帝皇之世,是知远也。”则此处疏通,乃是“简疏而通达”。《孟子·滕文公下》云“又使禹疏通九河”,则用为动词,开浚河中的郁塞使之畅通。“疏通知远”也作“疏通致远”,如陶潜《八儒》云:“颜氏传《诗》为道,为讽谏之儒;孟氏传《书》为道,为疏通致远之儒。”同为现代新儒家宗师之一的牟宗三,在徐复观逝世十周年纪念会上,说:“徐先生这个人对于维护中国文化,维护这个命脉,功劳甚大。这是我亲自切身的感受,疏通知远,功劳甚大。中国以前说,‘疏通知远,《书》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在这个地方,徐先生能保存这个意思,这是《书》教的精神。”并将徐复观的风貌品题为“精悍透辟”,又说:“徐先生的考证是活的啦!不是现在一般念历史那种考证——为考证而考证。要是站在纯学术立场讲,考证得最有

趣味的,最准最精密的,是陈寅恪先生。但是陈寅恪先生那种学问与大局无关。……至于其他那些考据家大体是瞎考,盲目地瞎考!所以你真能能找到考据家,有眼目,文章是活的,只有徐先生一个。我自己不做这种工作,我没这方面的本事。所以徐先生对我们的贡献是疏通知远。”徐复观去世前一年即1981年《中国文学论集续篇自序》云:“我常忘掉自己的年龄,还想在《两汉思想史》告一段落时,也用独立论文的方式,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选择若干关键性的题目,写成十篇左右深入而具有纲维性的文章,以完成这一方面的心愿。及去年八月在台北发现胃癌后,知道这一切已成梦想。”此处所谓“关键性”、“纲维性”与上述牟宗三所说的中国文化的“命脉”有相通的意思。徐复观以“心的文化”一语概括他对中国文化特质的认定,实际标出他在中西文化融会、古今学术贯通总的图景之中,重续中国文化慧命方向之下,一个新的打造,“心的文学”是其中应有之义。心的文化,是人的文化;心的文学,也是人的文学,只是这个“人学”更具有徐氏的学术个性。

20世纪50年代,港台现代新儒家有一个大论断,即:中国文化的出路,必发扬旧根柢,再加西方化。这个论断与近代以来“中体西用”有区别,所谓“旧根柢”者,更加精粹;而所谓“西方化”者,也更加宏阔,而且“根柢”有一种优先的意义。人文学任何一个分支,必然先有一个根本的生命体,有了这个生命体,才谈得上吸收和创造;就好比一个人,本身连吃饭的能力都没有,甚至连接受任何营养及药物的能力都没有,只是一具无生命的僵尸,那么让他锻炼身体、增加营养,都是空话。中国文化的生命,中国文化的根本资源,则来自“旧根柢”。“西方化”也是不能忽视的,事实证明,西方文化的因素已经渗透中国,闭守的“中国性”与简单的“去西方性”都只是假的命题,没有可能。现代新儒家比一般全盘西化论者更注意研究西方文化,引进西方文化,他们“返本开新”的思路,就是在“发扬旧根柢、再加西方化”的逻辑上奠基。然而,这个“根柢”资源或生命,并不是现成地、很好

地保存在那里,历史上长期的芜塞,近代以来的破坏,早已暗昧不彰甚至面目全非了。如果想追求它的纯粹与活泼,只有再向上追根溯源,愈至源头,愈接近人类生命共通的本原,也就最富有解释力量。徐复观“疏通知远”的学术创造,也奠基于此。

徐复观的疏通工作是从先秦中国人性观念的发展开始的,他发现在中国文化的基底中,蕴藏着极为深厚的人文精神,他称之为“中国人文精神”。此人文精神萌动于周初,表现为一种忧患意识。《易·系辞上》云:“(天地)鼓万物不与圣人同忧。”《易·系辞下》云:“《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周人作为胜利者,不是趾高气扬,而是怀抱忧患意识,将吉凶成败的命运落在自己的责任之上,由宗教的世界通向人文的世界。此精神的实质,是人对于人性本善的肯定,相信人类在共通共感之中,能够打理好自己的命运。中国人文精神分化出社会批判精神、担当意识、理性精神等,一直流注于中国士人精神的底流之中。在学术中,则通向经世致用的品质。但是,中国人文精神在长期专制政治的高压之下,却有种种变相。比如董仲舒,他创造了天人合一的哲学系统,以阴阳五行作为理论基础,从表面上来看,这是与先秦时期已跃动的人文精神逆反的,然而在背后,也包含一种极大的责任心,一种沉重的使命感,与中国人文精神是一脉相通的。如果不加疏通,董仲舒在中国思想史上则别是一种面目。比如杜甫诗中的“苦难精神”,是面对苦难世界所发出的沉重喟叹,一种责任的担当精神。然而历史上长期以来,在杜诗的解释中,只向“忠君”的方面发挥,说他一饭未尝忘君,虽从当时语境来考察也是一种事实,但却未见出其忧患意识的实质。对中国文化灵根资源意义的认定和保护,是徐复观的志愿;对长期中国历史上专制政治、门第观念、士人苟且享乐之习毒素的认定和挾发,同样也是徐氏的另一个志愿。这里不但使他与一般现代知识分子有所区别,也使他在现代新儒家阵营中有特别的标志。

中国文化从大的传统来说,众多思想流派都落实在人的“心”上,

不管是儒家的“仁义之心”、道家的“虚静之心”、禅宗的“空净之心”，心是“人”的凝缩，而心则又是生命与理性的合一。不管是道德还是文学艺术，皆是由心而发。《尚书·尧典》云：“诗言志。”《毛诗序》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心表现于文学作品之中，便成文学的形貌，唐宋以前称为文之“体”。文体观念将作者的人与作品的形貌联系在一起，强调作者人格的养成——中间经过“气”——与创作结果发生联系，作品背后是活生生的人，因人显现而成就作品的美。这可以称为中国文学最大的传统。然而，自唐宋古文运动以来，在古文占据主流的理论系统中，文学的“体”观念发生了变化，转而以文类为文“体”。唐宋古文运动特标“文以载道”为旗帜，“道”在高层意义上指向道德责任感及理性追求，未尝不能作为强调文学某种品质的理论因素；古文家的优秀作品，也未尝没有创造出一种大巧若拙的文学形貌。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不管是唐宋古文家，还是宋代黄庭坚及江西诗派，其本身逻辑中都同时包含“非艺术”的倾向。因为他们在大方向上，皆表现出与“诗言志”传统某种程度的疏离，以及“文体”观念的削弱。清代桐城文派，方望溪（苞）提倡“义法”之说，刘海峰（大櫟）强调神气，姚惜抱（鼐）则转而谈文学的形貌，表现出一种向文学形体追求的回归。徐复观抽绎桐城派论文遗绪，回溯先唐论文基点，将《文心雕龙》文体观念予以追回，并继而以中国的文体理论与西方形象理论加以沟通，试图建立中国文学的文体论，在“心的文学”理论上做出创造实绩。

清代乾嘉学派的出现，是中国学术通向近代的一大关节。这个学派的思想基础与走向，强调训诂通经，强调实事求是，未尝不是扭转虚浮空疏学风的积极变革。然而后来它特别标举汉学的旗帜以攻击宋学，强调一切义理皆从考据出（钱大昕语），训诂明而义理明，把学问的工夫，只限于训诂章句之上，最终蔑弃义理；并且他们也并非真正的“为知识而知识”，在研究的实践中，则往往怀着排挹宋学的成见，将思想性的内容排除掉。20世纪初，一些曾受今文经学影响的

人,又转回到考据中去。胡适由西方学术提倡科学方法,后来又提倡整理国故,提倡乾嘉考据学派。他们与乾嘉学派不同的地方,则是为了打倒国故而提倡考据,与乾嘉时代的人相比,远为速成而粗率。这个学派的末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是极为严重的。其一,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国文化中特色与核心地位的心性之学,比如把提倡价值哲学的张东荪、张君勱等人称为“玄学鬼”。其二,为了达到打倒中国传统文化的目的,以考据为手段,将传统中许多有光彩的人物,加以贬损。凡是能支持他们论点的论据,即使只是一点影子,也要加以放大曲阿,引向自己的结论,而对于不利于自己结论的材料,即使再明显,再有力,也视而不见。其三,在文学研究中,将作者生平的一些背景材料,甚至于一些无根游谈,硬性地与作品内容相联系,使作者和作品都受到歪曲。以上三点胡适本人特别突出,比如他关于井田的考证,关于《红楼梦》、老子传略、说儒的文章,以考证为名,而论证过程“速成大胆”,发表之后,引起学者辩驳,结论很少能坚确不动、令人信服。对于中国文化来说,这无疑有灰尘和泡沫的成分,形成郁滞是可想而知的。徐复观关于中国文学思想史、文学批评史的考证文章多由此而发,他清除了不少通路上的荆棘,比如对于李商隐(义山)生平及其《无题》诗的论考,认定义山一些难懂而有魅力的诗,与其婚姻有关,多来自他与妇翁王茂元不睦的关系,将义山诗定位于男女爱情、生平际遇、时代风云及忧世情怀之间,重新树立了义山人格及诗的价值;并由此阐述了用典与比兴关系的理论问题,显发中国诗学的理论传统。

五四新文化运动摧枯拉朽的气势,从正面来看,可以看出中国文化的生机,从反面来看,则可以看出中国文化经脉的阻断。但是,处于领导主流地位的第一代五四知识分子,并不是接通中国文化的经脉,而是以政治革命的方式,先行破坏,以“砸烂孔家店”为口号,彻底否定中国文化的价值,拟将中国文化传统砍断。文学大众化的口号虽然包含着政治革命的目的,但其中因为适应了近代平民化、民主化

的思潮,白话文运动便极容易得到支持和响应,似乎取得了成功。但反响与支持本身,却并不完全意味着符合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中国历史文化的丰富资源,蕴藏在以文言文为主的一个大系统内,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惜断然采取“挖祖坟”的方式,想挖掉中国文化的根茎。他们认为,从外国、从民间,便可得到足够的资源(后来还将民间称为文学艺术“唯一的源泉”)。而实际上,文化上缺少内在传承的创造是极为少见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中国文化传统人为地砍断所造成的负面作用,要到若干年后才能见得清楚,就文学来说,当时即使口称埋掉旧文学的人,对中国文学固有资源的吸取本来并不少;他们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批判精神,本来就与中国文化中士人精神一脉相承。但他们偏激的言论(如鲁迅,让青年少读或不读中国书,多读外国书),离开他们论述的语境,破坏作用是极为明显的。到了20世纪后期,没有真正读过文言文的中国作者,拿出缺乏历史文化厚度的语言写作,文字之削薄,是可以见证的。这种负面作用亟待清理,徐复观作为第二代五四知识分子之一杰出者,对五四的反思是深刻的,也比较早(后来大陆思想界学者对此问题有专门的讨论)。在他的逻辑中,五四新文化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斩截比历史上任何冲击都来得严重,如果原来多有郁滞不通之症,则这里无疑是将活的生命消灭,后来的人要起死回生,谈何容易!所以他在解释杜甫《戏为六绝句》“转益多师是汝师”时,看杜甫时代的人学诗,心中存着“新旧古今”的隔阂,而现代却仍有人释为杜甫在菲薄初唐四杰,“新旧古今”的隔阂更为突出,所以在学术论析之余,用心特别深切。

徐复观对于中国文学重要理论问题提出来重新加以讨论,汰去夹杂,通其郁滞,而总以“心的文化——心的文学”统领之,这不仅是通古今之变,去古今之隔,也是将中国文化融会于人类文化的大流,回应“中国文化——中国文学能给世界什么”的问题。他论述、考证中国文学问题,常常以西方文学相关理论加以参证、对比,取其贯通之处,借取西方文学理论逻辑推理的优势,以显发中国文学理论的丰

富内涵；同时也映照出西方文学一些弱点甚至误区。他论述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心”时，特别指出与西方“唯物、唯心”的区别，又与精神分析的“深层心理”划界立义，他以西方文化、西方文学的特点，照出中国文学的特点，归于显示中国文学的鲜活处、精彩处、伟大处、厚重处，显示出一个传统。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对于中国文学的疏通，也包涵“通中西之邨”。

徐复观虽然中年以后才开始潜心学术，但由于他早年已奠定深厚的国学根基，后来对中国政治、中国文化的现实感触极深，回归学术界之后，在哲学、政治、文学、思想史众多领域取得了突出的学术成就，已有专著30余种刊行于世。同时，他也是一个颇能打开学术讨论场域的人，生前他的著作已引起不少的争议，身后，他在众多学术领域提出的问题一直是学术界“来风的地带”。关于徐复观其人其学的研究状况，从我个人了解的情况来看，约有下列诸端：

其一，回忆梳理其生平与学术。这主要是徐复观的同时代人、故交、学生，从学术的角度，或制作年谱，或撰写回忆性文章。如牟宗三、涂寿眉、胡秋原、曹永洋等，皆有撰述。

其二，沿着新儒家的学术路向，继续作中国文化的返本开新、中西融通的文化重建工作，将徐复观作为继承的资源加以阐释研究的，这主要是徐氏的一些弟子，杜维明是其中的代表。

其三，认同徐复观学术的基本方向，将徐复观学术成果作为发扬的资源，而着眼于台湾文化生态，试图为其思想文化建设做出探索的。如黄俊杰有《儒学与现代台湾》，其中多篇为徐复观专题研究，李明辉有《徐复观与殷海光》等文并与黎汉基编《徐复观杂文补编》六巨册，陈昭瑛有《当代儒学与台湾本土化运动》等文，李淑珍有《徐复观论现代艺术——就台湾文化生态及儒家人性论双重脉络的考察》等文。

其四，大陆学界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关注并启动港台现代新儒家的研究，徐复观即被列为代表人物之一，其学术专著及论文